

红旗

H O N G Q I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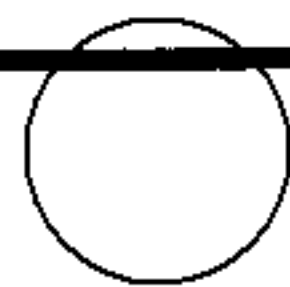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

一九六六年

7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七期 ★

目 录

评“三家村”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姚文元 (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解放军报》社论 (20)

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 (24)

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

邓拓贩卖的是什么货色? 陈同浩 (32)

邓拓, 我们就是要斗倒你! 陆志天 (33)

吴晗, 不许你反党反社会主义! 楼 森 (33)

把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李素文 (36)

突出政治, 大写英雄

——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 仲正文 (39)

☆ 五月十一日出版 ☆



評 “三 家 村”

——《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动本质

姚 文 元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是一篇大谎话。《燕山夜话》的作者是邓拓，《三家村札记》则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担任了《前线》的主编，又把持和垄断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岗位，他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难道只是一个什么“丧失警惕”“没有及时地批判”的问题吗？放出了这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头脑里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吗？对这个大骗局需要彻底揭穿。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策谋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的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向党和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当时看看吴晗的问题掩盖不住了，慌忙由邓拓出来搞假“批判”；反面人物唱久了，要装正面人物，总是装不象，露出了不少马脚。现在，看看邓拓也保不住了，又急急忙忙用编辑部的名义出来搞一个假“批判”，顽强抵抗，阻碍斗争进一步深入。但装得更不象，马脚



就露得更多了。什么“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什么“没有及时地批判”，统统是骗人的，无非是想用“批判”邓拓及“三家村”的幌子，把自己装作还是站在正确方面，欺骗读者，欺骗党。

采取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把问题说得清楚呢？怎么可能去“展开严肃的批判”呢？按语中说：吴晗“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被撤了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这件事他们曾经想掩盖，但早就掩盖不住了，现在只好被迫承认；按语中又说：廖沫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可是在末尾说到邓拓呢，只是“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字不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人很难相信了。一百五十多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许多毒草，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吗？只是宣传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吗？只是一个思想错误而不是政治问题吗？“三家村”有两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另一家写得最多的反而只是“提倡向死人学习”而已，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假批判，真蒙混，无非是演一出“批判”的戏给人们看，以抗拒党中央的指示，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配合这个按语而整理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虽然长达两版，却同样掩藏了尖锐的政治问题。几个部分的标题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标题表现着编者的倾向和判断。这种编法从侧面告诉读者：《燕山夜话》没有或极少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内容，与《海瑞罢官》性质不同。把歪曲双百方针醒目地放在第一部分，把“以古讽今”放在最后，寥寥数语，轻描淡写，略加点缀，勉强凑了两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者苦心所在。

我们一查对，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量十分恶毒地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言论不予编入或加以删节；明明是最刻毒的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故意避重就轻地列入其他部分；《燕山夜话》在全国的恶劣影响，只字未提。相反，把某些并非要害问题的内容，大事铺陈，煞有介事，企图化大为小，蒙混过关。尤其是隐藏了这样的事实：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



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毛泽东同志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一定会出现种种假象，只有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地揭露事物的本质，才能不为各种假象所欺骗。既然《前线》《北京日报》突然端出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问题，又掩盖了真相，一切革命的人们当然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它的反动面目。《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虽然内容十分庞杂，但一分析，就可以看到它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在这几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刮起了一阵乌云。现在，是到了进一步揭开“三家村”这家大黑店的内幕的时候了！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怎样开场的？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都是紧接着《海瑞罢官》开场的。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一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发表。这个戏的反动本质现在是愈看愈清楚了，它的矛头对准庐山会议，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它要翻庐山会议的案。戏中叫喊“海青天”即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罢官”是“理不公”，右倾机会主义者应当再回来主持“朝政”，贯彻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支持右倾机会主义者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海瑞罢官》作者当时的迫切心情。这也是“三家村”的“兄弟”们在当时的共同心情。

剧本一发表，立刻得到一些人的捧场和支持，“三家村”的兄弟们以为先锋出马得胜了，欣喜欲狂，得意忘形。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廖沫沙在《北京晚报》上摩拳擦掌地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开始大干”。这是“三家村”的早春气候。接着，二月十六日，廖沫沙公开致信吴晗，向他“破门而出”表示“祝贺”，“以便鼓舞干劲”，并建议“‘史’和‘戏’必须分工而合作”。二月十八日，吴晗在回信中以先锋的身份向他的“老兄”说：“也要向老兄建议，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他拍着胸膛说：“你说我破门而出，这句话点着了。我就是破



门而出，这个门非破不可”。好一副进攻的姿态！好一派汹汹的气势！真有点拼一拼的样子。他当时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抛出《海瑞罢官》之后，腊鼓既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大呼“这个门非破不可”之后一周，吴晗在《“神仙会”和百家争鸣》一文中，大呼“一层层的神仙会，一直开到基层”，“因为基层的成员都是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实际，问题更具体，更突出，更集中”。他高喊要在基层中“怀着鬼胎”的那些人都行动起来。他高喊要“扫清百家争鸣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并且得意地自我吹嘘说：“读了四十多年书，教了一二十年大学，也写了几本书，似乎也可以算个知识分子了。”这表明，他自以为有本钱，又有后台老板撑腰，现在是他们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场大施威风的时候了。

就在这一阵阵的密锣紧鼓声中，在《海瑞罢官》所掀起的黑风迷雾造成的“热烈”气氛中，在吴晗“扫清道路”的棍子“扫”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一九六一年三月，主将登台了。《燕山夜话》“按照朋友们的建议”“破门而出”了。邓拓说，他是“被人拉上马的”，错了，应该改作“被人请上马”的。先锋开路，“兄弟”执鞭，主将不是该上马了么？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的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场表明，这是《海瑞罢官》抛出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



地向党继续进攻。要把“三家”的作品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彻底揭露这家黑店的内幕。

一条黑线 几股妖风

邓拓自己说，《燕山夜话》的题目是这样来的：“我常常想到、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觉得有了问题，随时就产生一个题目”。邓拓身居领导岗位，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听到”的是谁的话呢？这里他透露了《燕山夜话》都是针对当前现实生活中他不满意的“问题”而发的，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内容是“听”来之后再经过他编排成文的。这些文章的出发点和主题，都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性，不是什么一般的“美化古人”。根据作者指出的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条黑线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随着“想到、看到、听到”的“问题”不同，选择不同的攻击方向，“分工合作”，相互呼应，四面配合，掀起了一阵阵的黑浪，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中央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指出：“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全会的公报中尖锐地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他们刮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风，极力诽谤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紧接着这次全会而开场的《燕山夜话》，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些经济上的困难，集中地掀起了一股攻击总路线和支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妖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拓提出了“欢迎‘杂家’”的口号。这些“杂家”是什么人呢？据他说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人。他还说：“旧时代知名的学者，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他警告党说：“现在我们如果不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



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请注意“领导工作”，这是要害。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之流的反动人物。邓拓文章里当作大菩萨抬出来的帝王将相、三教九流、封建顽固、直到风水先生这些“杂七杂八”的死人，都是“杂家”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他自己就自命为一名头号“杂家”。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不正也跃跃欲试地要“领导”“重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广博知识”吗？他们不是想用自己这种“知识”使社会主义企业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吗？“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而提出的，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句空话。“三家村”里的“杂家”们不是果然把持了一批“领导工作”吗？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



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



呼声，决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利用我们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出了更加猖狂的全面进攻，妄想在我们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欢呼“这半年多米”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



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



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被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来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大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〇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猗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



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阻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

《为李三才辩护》是《海瑞罢官》的续篇，“李三才”就是罢官之后的“海青天”，“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三家村”所有直接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的材料太多了，举不胜举。仅就《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几股妖风中的部分文章，已经可以看到“三家村”里的黑幕多么惊人，这一小撮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怀着多么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者如何无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们盼望中国变颜色，从红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这个黑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巢穴，内藏毒蛇，必须彻底弄清它，捣毁它！大家起来，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这是我们当前的战斗任务！

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除了露骨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外，《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还有一批以所谓“学术”“考据”“休息”的形式出现的大毒草，它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知识”的掩护下，向社会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它们不是一般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吹捧死人”，而有它现实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它配合那条露骨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麻痹人们的革命警惕，欺骗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用“软刀子割头”的办法，全面地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各个领域中坚持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地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推行“和平演变”。任何人对这一套上瘾了，入迷了，就会变质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锋铓毕露的毒箭，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是“三家村”中使出的两手。

邓拓在《燕山夜话》第一篇文章，就以占领“生命的三分之一”作为自己的招牌，说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决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想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为占领其他“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话》，是为了麻



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燕山夜话》大量运用了答复读者的形式，邓拓且在文章中大量谈到如何接见青年，如何从“老乡”“同志”“朋友”“孩子”“编辑”“学生”“文化教员”……以至在各个部门的“工作”的业务人员中得到“启发”“建议”，或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到他们活动面之广。宣传反社会主义思想，是同广泛的活动相结合的。毒害一批人，拉拢一批人。他们竭力想在“学问”的掩护下把青年诱入“三家村”大黑店的圈子里。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邓拓在《人穷志不穷》中说到：“一位青年学生前天来看我”，“想把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选译成语体文，问我赞成不赞成”。《贫士传》是一本为破落地主阶级分子立传的书，特别鼓吹地主阶级所谓“骨气”，对今天人民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这位学生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但还没有拿定主意。一到邓拓手里，他如获至宝，不但赞扬他这个想法“很好”，而且立刻发挥了一大通政治道理，把翻译《贫士传》作为向地主阶级“肃然起敬”、向地主阶级学习“崇高的气节”联系起来，并且暗示这可以作为某些人物“将来他们万一遇到某种意外的穷困”时作为“学习”之用。这不是明明推人落井、并且落井下石么？这不是利用这个青年为今天那些“贫士”即反社会主义分子服务么？“北京广播学院的一个同学来信”，这个“同学”也是被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了，满脑袋低级趣味，专门注意“公共汽车上”某个“女人的头发”多么长，要邓拓“说说这样的长发对我们有一点点什么启发”。邓拓立刻写了一篇腐烂的典型的阿飞作品，不但支持了这个“同学”，而且从历代最糜烂的皇帝的宫廷生活中挖出各种“美人”的“长发”来大做广告。这不是引导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进一步走向腐化堕落、演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么？一切受到“三家村”毒害、拉拢的青年，应当起来控诉他们这种罪恶的勾当！

从这个观点去看那些宣扬反动思想的作品，其政治目的就很清楚了：

他们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他们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教育的基础，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生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反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和教育青少年一代，掩护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他们竟然鼓吹“旧科班的这一整套方法是符合于教育学原理的”，要“整个社会全面地采用这种方法”，用所谓“量才而用之”取消阶级路线，“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们极力向青年提倡什么“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途径”，什么用“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什么“读尽一切资料”来“打基础”，……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成名成家问题，主要是想用这个办法腐蚀、拉



拢一批人，收罗一批“三家村”的信徒，成为他们反共言论的传播者，使某些青年变成“三家村”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用“学者”“名人”作诱导，其言极甜，其心极毒。

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他们提出一个“多学少评”的口号：“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恶毒地讽刺高举革命旗帜的人是“喜欢挑剔”，“动辄加以讥评”“一定会吃大亏”。什么叫“多学少评”？就是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吹捧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只许他们用“学术”去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不许我们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取消一切革命的人们批评他们的权利；这就是说，对剥削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圣旨，不能动一根毫毛。打击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巩固黑店对学术部门的控制权，支持一切毒草包括“三家村”中的大毒草不受任何阻碍地大批出笼，这就是他们反动学术路线的核心。

在文艺上同样是这样。同“多学少评”一样，他们制造了所谓“一视同仁”的口号：“任何剧目都是平等的，现代剧目也好，传统剧目也好，我们应该一视同仁”。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平等”，根本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只能是谁战胜谁。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代戏，就一定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古代戏；吹捧“戏剧遗产”中“有完全适合今天需要的好戏”，就一定要打击、压制革命的现代戏。“一视同仁”是一箭双雕：打击任何大力支持革命现代戏的做法；抬高和保护大批毒草不受批判，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服务。

他们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他们向人们推荐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骨气”“清高”“涵养”“赚钱”……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要向反动哲学家朱熹学习“涵养功夫”，要向张诗学习“鄙视劳动”的“反抗精神”，要向孔子学习“克己复礼”……甚至大力鼓吹恢复地主阶级的“作揖”！这是公开要求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套实现了，岂不是把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践踏光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变成一个以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看见剥削阶级分子就要“肃然起敬”，这不是反革命复辟了吗？广大工农兵不是将重新受到那些有“骨气”的“君子”即顽强的剥削阶级分子残酷压迫了吗？

他们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身份，公开要求为地主阶级立传了。请读读邓拓这段话吧：“过去各地方编辑地方志的时候，照例要提出一批所谓‘乡贤’的名单，然后收集资料，分别立传。我们现在如果要编辑北京志，那末，显然也应该考虑给宛平大小米（指明清官僚米万钟、米汉雯）以适当的地位。”“过去”，是封建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照例”是“照”地主



乡绅特别是恶霸地主的“例”，肉麻地捧做“乡贤”的统统是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要“我们现在”为这批“乡贤”立传，就是要把土改以来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其祖宗牌位重新捧出来，让广大贫下中农重新沦为“乡贤”的牛马！这不是猖獗得无法无天了吗？响应主将的号召，《三家村札记》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为军阀、官僚、地主、“反面人物”立传。这是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复辟活动。这正是为了增加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为他们重新统治中国人民创造条件！广大工农兵决不允许这种罪恶活动得逞！

以上所引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材料。可以看出，在“学问”“知识”的幌子下，各方面的宣传都集中到这样一点：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力图使干部、青年蜕化变质，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家村”津津有味地描绘的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都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表现。人们从这里，可以看透“三家村”的将士们腐烂了的灵魂。吴晗有一句“名言”，“业余时间是第一兴趣广泛驰骋的自由天地”。这句话揭露了他们平常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开会、工作、报告……等等都是假象，都是勉强的，都不是“第一兴趣”；到了“业余时间”，到了“三家村”里，他们的本来面貌——“第一兴趣”才放肆地暴露出来了。除了密谋策划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外，吃喝玩乐，谈猫吹狗，捧地主，玩古董，打麻将，做买卖，追求苏联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套，从狂诵杜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而“心里是酸酸的”，直到从“美人”的“长发的奇迹”中得到“启发”而心里甜甜的……什么腐烂的事都干得出来。这是两面派，伪君子。其中一部分就形诸文字，用来腐蚀人民，腐蚀我们的党。

要懂得什么叫“和平演变”吗？请看“三家村”这个活标本。他们这一套丑恶的言论，他们的活动方式和想达到的结果，就是在最准确的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从这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教员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

退兵时的策略

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次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响亮



地吹起了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号角，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见势不妙，开始了退兵。主将先退，一九六二年十月，邓拓立刻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奉告读者”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

《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是九月二日发表的《三十六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表明要溜了。在编印集子时作者心虚地把它夹在当中，不按发表时次序放在末尾，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篇文章含义深长地说：“檀道济当时所用的计策，并不只是以‘走为上’；如果没有其他计策，他要走也走不了。可是他用了疑兵、反间等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才能安全退走。”“三家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除了继续进攻外，的确用了“几种计策，互相配合”，想在革命人民发起反击时“安全退走”。所以还演了不少“好戏”。请看他们的“计策”：

一、在《燕山夜话》第五集中假惺惺地“奉告”：“前一个时期写《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一面表白并不是有意识的进攻，“上马”“下马”都是被动的；一面暗示“将来”某个时候形势有利时要“再写”、再干。

二、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也写一些《石油颂》之类的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的文章，以掩护退却。

三、鼓动各地响应《燕山夜话》而办起来的“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保持更多的阵地。

四、一九六三——六四年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展批判，为了避免由廖沫沙而暴露整个“三家村”，一九六四年七月收起了《三家村札记》的招牌。

五、由廖沫沙出面做一篇假检讨，说什么“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的头脑中”“还占居统治地位”，是“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请注意，这同吴晗后来在“自我批评”中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又说他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廖沫沙既然只是孟超的“帮手”，当然不会再去追究“三家村”了。此计不可谓不妙。

六、批判《海瑞罢官》之后，向阳生即邓拓又赶紧出来写一篇“批判”文章，说什么《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思想基础”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面掩盖《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上的反动性，向吴晗抛救生圈，企图把讨论引到死胡同



里去，一面又表明“三家村”并不存在，同吴晗“决裂”。末了又透露一笔：“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指示吴晗下一步棋如何下。

七、吴晗立刻响应号召，一再写文章对向阳生表示“感谢”，继续以“自我批评”之名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恃无恐地大捧自己，并把廖沫沙“检讨”中的法宝搬过来：“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又说经过向阳生的“批判”，“使我认识了错误。”似乎可以蒙混过关了。

八、最后，看看形势不妙，又突然以编辑部的名义来“批判”邓拓，使尽了金蝉脱壳之计，来掩护退却。

这么多的“计策”“相互配合”，可以“安全退却”了吧！？耍了这么多花招，他们实在欺人太甚！但是，他们把革命人民的辨别力估计得太低了！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心估计得太低了！他们包得住么？他们溜得掉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教育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决心要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他们自以为是聪明得很的种种计策，其实做了蠢事，适足以暴露自己。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反动政治思想”，而且有共同的行动计划，是一小撮人组成的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九六二年三月，正当“三家村”疯狂进攻达到高潮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写了一首词，叫《黑天鹅》，其中有句道：“春风吹梦，湖波送暖，唯我先知！”他是多么得意地以灵敏的“先知”自夸啊！但是这一回，“先知”不灵了，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才是真正的先知。请看“三家村”的内幕，不正在被广大人民逐步地揭露出来吗？

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这样狠毒、这样放肆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竟能连续达数年之久，原因是什么？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么？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什么在挂帅呢？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毛泽东同志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三家村”集团步步为营且战且退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普遍真理。反动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只有经过一步步艰苦的斗争，无产阶级才能逐步从那些“杂家”手里把阵地夺回来。

“三家村”集团的触角伸到了不少部门。《燕山夜话》在全国散布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它以“知识性”“文笔美”为幌子，很能吸引一部分缺少政治辨别力的人，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都不乏赞赏者和追随者。邓拓自己也吹嘘，“许多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和论证，得到朋友们的赞同”，“远处的读者来信渐多”，“其他地方有些报纸，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形式，发表知识性的专栏杂文。”也有一批“响应”《燕山夜话》某些论点的文章。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北京晚报》还用大字为《燕山夜话》的出版大做广告，吹嘘“作者抓住当前的一些问题”，“既富有思想性，又可以丰富知识”，千方百计扩大它在人民中的毒害作用。腐蚀极大，流毒极广。需要广大工农兵群众起来，从各个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进行更深刻的批判，才能肃清它们的恶劣影响。

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

毛泽东同志这样地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多么需要发扬这种从共产主义事业出发的原则精神和批判精神！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不管“三家村”散布了多少毒雾迷尘，在千千万万手执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的工农兵的奋起斗争下，它一定会被彻底澄清。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将照透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一切魍魉鬼魅都显出自己的原形！

（原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

本刊转载时经作者作了小的校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解放军报》社论

本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发表以后，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纷纷来信来稿，积极参加战斗，对文化领域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表示极大的愤慨。大家认识到，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对这场斗争不能不管，不能不问。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事实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解放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有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停止过呢？譬如，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后来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九五七年对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猖狂进攻的反击；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电影、戏剧、文学等方面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毒草的大量出现和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一九六四年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以及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论战，等等。一场斗



争接着—场斗争；一次斗争比一次斗争更深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就说明，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本性，总是要想尽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迷恋资本主义，死抱着资产阶级的僵尸不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敌对情绪，内心憋着一股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和怨气，一有适当的气候，就冒出来；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笼。他们在一再地遭到广大群众的揭露、批判、打击以后，就采取了更加**隐蔽、狡猾、迂回、曲折**的手法，继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对我们的进攻，具有新的特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人利用党和政府给予他们的职权，把持了一些部门和单位，抗拒党的领导，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工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这些人**大都是一些所谓“权威人士”**，在社会上也有点“名气”，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们还有一些迷信。他们自认为还有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资本，拚命地固守着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堡垒。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是和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相呼应的，是和国内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一鼻孔出气的，是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相配合的。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严重的危害性，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至于有的人也写过一些不好的作品，但是他们同党和社会主义是一条心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改正的。对这样的同志，应当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毛主席早在全国胜利以前，就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资本主义复辟，总是采取暴力的形式和“和平演变”的形式，或者是两种形式的互相配合。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不仅企图使用暴力推翻我们，而且还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用“糖衣炮弹”来征服我们。他们千方百计地散布反动的政治思想毒素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企图腐蚀和溶化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使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薄弱者，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逐渐蜕变为资本主义。列宁缔造的、十月革命炮声中诞生的、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一小撮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和把持之下，已经和正在“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上去的事实，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生产



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对于同不拿枪的敌人的战斗，是绝对忽视不得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解放十六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并日益巩固，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它们不仅阻碍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且力图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化，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我们一定要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决不要以为，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只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什么大事。决不要以为，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只是“打笔墨官司”，无关大局。事实上，任何反革命复辟，都是先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搞理论、学术、文艺等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为自己制造舆论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夺苏共领导是这样。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也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扮演了打先锋的角色。当前，我们国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也正是妄图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如果我们对这些不拿枪的敌人失去警惕，不对他们进行坚决反击，任凭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社会主义的墙脚就有被挖掉的危险，我们的国家就有变颜色的危险。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和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主要支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我们既要密切注视拿枪的敌人，随时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们的武装进攻，又要高度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我们的干部战士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做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反对“糖衣炮弹”的政治思想战线上做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见到错误的东西就批判，见到毒草就铲除，见到牛鬼蛇神就打倒，决不能让它们无法无天、兴风作浪。

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正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来的。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我们突出政治，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军队中来，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上来。我们决不能低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我们的影响。好的文艺作品，好的文章，可以提高我们的觉悟，鼓舞我们的斗志。坏电影，坏戏，坏小说，坏文章，如果不去鉴别它，抵制它，批判它，思想上就会中毒，就会逐渐地发生变化，走到邪路上去。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敌人，不管他如何凶恶，不管他要什么花招，都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自己麻痹起来，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当前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生动、最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干部战士政治思想上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革命热情，密切注视和关心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积极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从中得到锻炼，得到教育，得到改造，得到提高。

毛泽东时代是工农兵掌握理论的时代。在这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群众正在显示出它的主力军的作用。虽然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者”、“专家”、“教授”，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但是，他们是吓不倒我们的，也是迷惑不了我们的。我们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有一颗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火热的心。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干部战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嗅觉灵敏，眼睛雪亮，能够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只要我们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敢于藐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的所谓“权威”，破除对他们的迷信，我们就一定能够识破和揭穿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把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五月四日《解放军报》）



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戚本禹

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为这个资料加上了“编者按”。当天出版的《北京晚报》，也以三个多版的篇幅选登了这些资料。声势之大，是这几个报刊创办以来所罕见的。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现在如果能对这许多毒草进行认真的批判，并且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前线》《北京日报》现在的这种作法，是不是在认真地批判毒草呢？是不是在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呢？不，不是。

你们批判过吴晗吗？

没有。

从一九五九年吴晗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以来，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间共有六年多。在这六年多时间里，《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没有揭露过吴晗一个字。相反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却在这个期间积极发表文章，为吴晗，为吴晗所塑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热烈捧场。“老兄老弟”们那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在所有吹捧《海瑞罢官》的文章中，是最不像样子，最恶劣的。

姚文元同志提出吴晗的问题以后，你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也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同志这样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不转载，不介绍，反而质问上海的同志：“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背景？背景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背景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学说，背景就是你们报纸上也登载过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在全国开展兴无灭资阶级斗争的决定。难道进行阶级斗争，还要经过你们



批准吗？难道不经过你们批准，就是没有党性吗？看来很清楚，你们所要的党性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而是资产阶级的党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时，你们的态度转变了吗？也没有。《解放军报》发表了旗帜鲜明的“编者按”，正确地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对《海瑞罢官》却既不讲是，又不讲非，只是说，这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其实，你们是支持吴晗，反对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前线》《北京晚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北京日报》出来转载一下，这是装出一副假公正的面孔，来掩盖你们真偏袒的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前线》《北京日报》突然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发表了署名向阳生的文章，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好像你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站到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前线上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篇同文化革命唱反调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为吴晗保驾。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道德继承”问题。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向阳生的文章里，变成了一个所谓“纯学术”问题。

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来为吴晗辩护。其实，你们从来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吴晗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压制无产阶级革命者。你们对于反动的东西，一直是开放绿灯，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大量出笼，而对于批判毒草的文章却一概扣压起来，不准发表，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折不扣的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哪里是什么平等呢？

向阳生文章的末尾还装腔作势地要求大家对所谓“道德继承”问题，进行讨论，企图为吴晗《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定调子，想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从尖锐的政治问题转到所谓“纯学术”问题上去。后来人们知道，所谓向阳生者，也就是同吴晗合写反党文章的邓拓。更为严重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邓拓还在《北京日报》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并且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同吴晗的文章一样也有错误。

隔了不久，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是一篇假检讨、真进攻的文章。《北京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



加任何按语，不作任何批判，这实际上是支持吴晗以检讨的形式向批评他的同志进行反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就心照不宣地对向阳生说，你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完成了反攻任务以后，就按照向阳生定的调子，在《前线》《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所谓自我批评，欣然承认自己错误的“中心”，是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两个人密切搭配，一唱一和，演了一场双簧。

一篇不够，调子定不下来。你们又接连发表同类性质的文章，一个劲地想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发表在今年一月八日《北京日报》上的李东石（即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的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抛出来的。这篇文章把吴晗《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说成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同一个《海瑞罢官》，一会儿是所谓“道德继承论”的产物，一会儿又是某种评价历史人物观点的产物，就是不肯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产物。

众目睽睽，营私舞弊是不行的。《前线》《北京日报》对吴晗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手法，迅速为大家识破了。不少报刊发表了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特别是今年四月以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知识分子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一种难堪的“将军”局面摆在支持、包庇吴晗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面前。于是，你们才扭扭捏捏地走出来说，“吴晗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的作者”，并且重新发表了吴晗过去在《前线》上发表的《赵括和马谡》，想以此敷衍塞责，欺骗读者。这就是你们对吴晗的所谓“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你们把一些人人皆知的事情，当做重要秘密来介绍，而对于吴晗忠实继承胡适衣钵，甘心充当美国洋奴，为国民党反动派出谋献策的种种罪恶活动却连一个字都不肯提呢？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

没有。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①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

^① 廖沫沙曾经在1934年用“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攻击鲁迅的革命杂文是“花边文学”。鲁迅用这句话回敬了廖沫沙，并为自己的杂文集取名《花边文学》。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1、397—400页。



“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助浪，在社会上散放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谑”》，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污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污辱，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梁壁辉（即俞铭璜）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个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这样一篇假检讨，当然蒙混不了群众。读者严肃地对这种假检讨提出了批评，但是无论是《前线》还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不理睬群众这种正当的批评。因为对你们来说，廖沫沙是必须好好加以保护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是万万退让不得的。

今年四月十六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为“鬼”张目，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目，为地、富、反、坏、右张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跟洋鬼、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你们批判过邓拓吗？

也没有。

前几年，代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在奔腾澎湃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里掀起了一股逆流。他们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



动进攻。邓拓在这场猖狂的进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吴晗、廖沫沙、邓拓，“三家村”反党小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邓拓。我们知道，就是这个邓拓，在一九六一年的九月，亲自出马，纠集吴晗、廖沫沙，在一个饭店里聚餐，组织起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黑店的名称是他起的，吴南星的化名是他定的，文章的刊登与否是他批的。“三家村”开业的历史，就是邓拓率领吴晗、廖沫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同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有一篇化名卜无忌《废弃“庸人政治”》的文章，就是他写的。这篇文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要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除此之外，他还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极右分子林希翎，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林希翎曾经称呼他是中国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连资产阶级右派也早已知道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邓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失败了。他在《人民日报》的职务被党中央撤销了。他被人民“罢”了“官”。在这以后不久，他又钻入了北京市委，重新上台，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

邓拓颇“懂得”一些斗争的策略。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惊涛骇浪，使他改换了自己的斗争方式。右派分子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广大群众批判、斗争的情景，使他心有余悸。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不再像一九五七年发表右派言论那样赤膊上阵，而是采取更加阴险、狡猾的方式同我们进行斗争。他凭借《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这样的阵地，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方法，连续不断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三种诸葛亮》《“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交友待客之道》《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为李三才辩护》《昆仑山人》《宛平大小米》《郑板桥和“板桥体”》《智谋是可靠的吗？》《王道和霸道》《马后炮》《古代的漫画》《林白水之死》《专治“健忘症”》等，是其中最甚者。

对所有这些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手法，十分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毒草，《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过去曾经作过批判没有？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

特别是那篇极端反动的《专治“健忘症”》，这是一支很恶毒的箭，它的矛头直接射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他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党。他要用“狗血”淋我们的“头部”，要用外国



特制的棍棒对着我们的“头部”打得我们“休克”，以让他们那些所谓“高明的医师”，也就是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这一篇疯狂的反革命杂文，充分暴露了邓拓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刻骨地仇恨党、仇恨人民的黑心肠。

邓拓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他们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写信，提出严正的批评。但是，你们对于这样的批评信都不予刊登，不仅不予刊登，反而千方百计地为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辩护。你们嘴上说的是“百家争鸣”，实际上行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家独鸣”。就是说，只许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放资本主义之毒，不许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铲除你们的毒草。你们实行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独裁，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形势陡起变化。一场新的反击战开始了，邓拓的合作者吴晗被揭露出来了。如果《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真正愿意揭露邓拓，这时候，你们仍然有一点主动权，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做。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你们还请邓拓做报告、写文章，支持、包庇吴晗。

客观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斗争不断深入。吴晗、廖沫沙、邓拓联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完全明朗化了。广大的读者对《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作法极端不满，愤愤不平，盖子非揭不可了。这时候，你们为了摆脱被动挨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邓拓等人，才匆匆忙忙地把邓拓的问题提了出来。

提出邓拓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邓拓等人，这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不，并不矛盾。

三个多月以前，《前线》《北京日报》不是就曾经为了保护吴晗，而积极发表了向阳生“批评”吴晗的文章吗？提出邓拓的问题，不过是这种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丑剧的重演。

《前线》《北京日报》在“编者按”里，极力回避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三家村”里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邓拓，在《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里却占了最次要的地位。吴晗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将”，而邓拓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轻重倒置，掩盖要害，牺牲车马，保存将帅，这就是《前线》《北京日报》在保护邓拓问题上玩弄的一套手法。

《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批判”邓拓的资料，同样不提邓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占了两个版面的《燕山夜话》摘要，只在最后用两个平淡不引人注意的小标题，提了一下邓拓的“以古讽今”问题。邓拓那些恶意攻击党，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动



言论，那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分子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也是为他自己的被罢官、贬官鸣冤叫屈的文章，都被《前线》《北京日报》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庸俗无聊”，“孤芳自赏”的东西，至多也不过是“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今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日报》又散发了一份“关于批判《燕山夜话》的参考选题”，说什么“邓拓是艺术上的复古派”，“站在古人的楼台上”，“宣传艺术越古越好”，继续为邓拓打掩护，企图引导读者把对邓拓的批判锋芒集中到“崇古师古”的方向上去。

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政治要害问题没有了。

这能叫做“批判”吗？把它叫做掩盖错误、包庇坏人、欺骗读者，不是更符合实际吗？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过去由于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利用报刊的专栏来开辟他们的‘自由市场’，……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

这能叫做自我批评吗？

“教训是很深刻的”。什么教训呢？

“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真是放松了吗？

“使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被别人乘虚而入吗？真是被别人利用了吗？

“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那末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在挂帅呢？

“头脑中又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吗？

“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是丧失立场吗？是丧失警惕吗？

统统不是。

《前线》《北京日报》，还有那份《北京晚报》，在最近几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身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不自觉地被人“利用”的问题。你们这个阵地，不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而是资产阶级的阵地。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就是安安稳稳地坐在市委、市人委的大门里当官做老爷，发号施令，忠实执行着修正主义路线，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梦想，而根本不是什么被“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乘虚而入”的问题。你们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喊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是挂着共产党的招牌，窃取党报、党刊的名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严重斗争的时刻，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加紧同无产阶级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放松了阶级斗争。你们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却有着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你们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顽固得很，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定得很，资产阶级反动嗅觉灵敏得很，资产阶级党性强烈得很。直到不久以前，你们还在挥舞板斧，把别人批判邓拓文章中的要害问题统统砍去，说什么“这个不能联系”，“那个不能成立”，“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还是按学术讨论搞”，这怎么是头脑中仅有一点儿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或者是什么丧失立场、丧失警惕呢？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抹胭脂搽粉，是遮盖不住丑陋的面孔的。你们过去放了那么许多毒，出了那么许多牛鬼蛇神，又要了那么许多恶劣手法来抗拒文化革命，今天用几句空话，就能向读者交代过去吗？

《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到了彻底革命的时候了。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大刮黑风的时候，是谁积极支持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遭到革命群众反击以后，是谁用各种办法包庇邓拓、吴晗、廖沫沙呢？后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问题包不住了，又是谁指使你们玩弄那一套“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假批判把戏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不揭发，群众要揭发，你们不批判，群众要批判。我们相信《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部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一定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彻底决裂，大胆揭露和批判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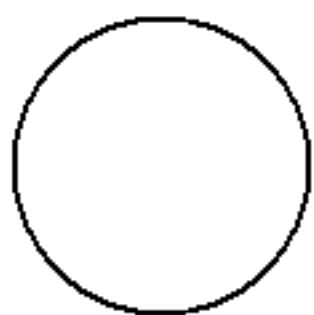
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把一批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下台去，但是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应该看到，还会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继续登台表演。不同的是他们的表演方式会经常变花样，有的是赤裸裸的，有的则比较隐蔽，有时分散出击，有时集中进攻。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当前的运动，坚决地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展开斗争，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

邓拓贩卖的是什么货色？



解放军某部排长 陈 同 浩

读了邓拓的“燕山黑话”，真使我气愤极了！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邓拓在暗夜里放出的这一支支毒箭，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说别的，单把他的《“伟大的空话”》拿来一分析，就很明白了。

一个孩子，以热烈的阶级感情，写了一首诗，表达对祖国对党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憎恶和仇恨，这说明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儿童，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迅速，爱憎分明。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每个革命者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可是邓拓听了却大为恼怒。他说：“这叫做什么诗？我真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孩子写的诗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革命的人民认为是好事，邓拓认为是坏事；革命人民赞扬的，邓拓反对；真是界限分明！邓拓究竟是个什么人，不是明明白白了吗？说穿了，邓拓对于孩子歌颂祖国

歌颂党，所以十分恼怒，无非是怕我们革命下一代成了红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就作不成了。

邓拓这篇《“伟大的空话”》仅仅是反对那个写《野草颂》的孩子吗？绝不是。他是在那里声东击西，以小喻大，他是在那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反对一切革命人民群众的壮志豪情。在他看来，一切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全世界革命人民，长人民志气，灭敌人威风的语言，都是“陈词滥调”，只有像他那样用以古喻今的手法，从黑暗里向党向人民发出的恶毒咒语，才是值得赞扬的“好话”，才不是陈词滥调。他真是好恶毒！

邓拓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向我们发出了挑战书，我们人民的战士就要起而应战。你邓拓放了那么多毒，今天我们有责任有权利来同你清算这笔账，绝不能让牛鬼蛇神滑过去！

（原载五月九日《解放军报》）



邓拓，我們就是要斗倒你！

解放军某部班长 陆 志 天

邓拓在《多学少评》一文中狂妄地说：“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他还阴险地说：“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保持虚心的态度。”邓拓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仅仅是反对开展学术批评，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唱对台戏吗？不。说穿了，就是让我们和一切牛鬼蛇神和平共处，让我们放弃斗争，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我们要问：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也应该包括在“一切事物”之中吧？对于这些人民的死对头、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也要“多学习、少批评”吗？邓拓的所谓“保持虚心的态度”，不是明明要我们认敌为友、拜敌为师，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吗？邓拓，我们正告你：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对待任何敌人，我们从来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坚决斗、斗到底，直到全部干净地把它们消灭掉。这是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历史赋予我

们的责任。

邓拓提倡“多学少评”，又因为他做贼心虚。他借古讽今，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特别怕被人揭露出反动的原形。有了“多学少评”，就可以为他自己及其同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打掩护。也就是说，邓拓叫嚷所谓“多学少评”，实际上是妄图把文化战线变成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沿阵地，而不准我们工农兵进行反击。谁要是起来反击，谁就是“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这是什么样的如意算盘啊！邓拓，你这套把戏是骗不过人的！你的反动本质我们已经看清了。是毒草，我们一定要把它连根拔掉，甩在粪坑里沤肥料。我是个战士，我就知道革命。谁要是破坏革命，阻碍革命事业的发展，我就要打倒它，扫除它。你既然如此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不是什么对你“挑剔”的问题，而是要和你斗到底！

（原载五月九日《解放军报》）

吴晗，不許你反党反社会主义！

浙江省义烏县下駱宅公社党委代理书记 楼 森
义烏县下駱宅公社贫协筹委会主席

我是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干部，对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写不出什么科学论文，但

是吴晗这种赤裸裸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却实在令人愤慨，因为怒不可遏，



也说出几句。

首先，我要问问吴晗：你为什么早不写，迟不写，却偏偏要选择在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发起猖狂进攻的时候，写出《海瑞骂皇帝》这样恶毒的文章来？你又为什么偏偏要在一九六一年社会上刮起“单干风”和“翻案风”，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突然“破门而出”，写出《海瑞罢官》这个恶毒的剧本来？你现在说，你“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但是，你以前不是说过“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吗？把这两者对比一下看，何以自圆其说？你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是披着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外衣，借海瑞的嘴脸，为地、富、反、坏分子，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擂鼓助威，以便使这些牛鬼蛇神，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重整纪纲”。好一个“古为今用”、“以古讽今”、“指桑骂槐”！可是，我要正告你：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你高兴得太早了！

吴晗是非常强调“历史真实”的。好吧，我们就让事实来说话吧。你说旧社会里有“清官”，能“为民请命”。这是抹杀阶级斗争，散布幻想，不要人民进行革命。但是，谁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是怎样受着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和剥削的。在那个世道里，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劳动人民经年累月，耗尽心血，到头来却落得个吃

的猪狗食，穿的百结衣，生命如草芥。就拿我家来说吧，解放前，虽然一度种过五亩多田地（包括租种地主的土地），但由于地租债利、苛捐杂税的盘剥和生活所逼，最后不得不全部出卖或典押给剥削者了。从此，一家七口，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常常穷得揭不开锅，个个皮包骨头，身瘦如柴，真是含辛茹苦，度日如年。我父亲死时，连棺材也买不起。说起我的邻居、堂兄楼章华家，更是苦不堪言。他一家六口，那时过的是什么日脚呢？他自己拖着吐血的重病，给地主打短工、挑脚过日；老大和老二从小就给地主当长工；老三和一个女儿，年幼力小，给地主看牛不要，只得去讨饭，后来患病无钱求医，活活地折磨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个“清官”为劳动人民请过什么“命”呢？这就是旧社会历史的真实。

“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①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才从火坑中得救，终于站了起来，扬眉吐气了。仍以我们两家为例：论政治，有四个共产党员，三个共青团员，一个公社干部，四个大队或生产队干部，两个县人民代表，一个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论文化，有一个大学生（现担任中专学校的教师），三个中学生，四个学龄儿童全部上了学，都戴上了红领巾；论经济，更是如雨后春笋，节节上升。像这样的翻身家庭，真是千千万万，数也数不尽。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页。



都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得来的。这也是新社会历史的真实。我们劳动人民将世代永远也不忘记这些历史的真实。“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这就是我们的誓言。

你吴晗以“马列主义史学家”的“权威”自居，为什么对如此史无前例的、极其伟大的中国阶级斗争史一概加以抹杀？

吴晗还打着“为民请命”的招牌，煽动农民“退田”单干。但是，我们贫下中农最清楚：只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农民起来闹革命，打倒了封建地主，我们贫下中农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历史教训又使我们懂得：小农经济不过是“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它只能使农民向两极分化，少数人发财致富，大多数人却贫困破产。因此，农民要想获得经济上的彻底翻身，只有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于是在党的正确指引下，我们自觉自愿地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办起了合作社，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公社。我们贫下中农也因此而成了集体经济的台柱子，自然也就把集体经济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了。用我们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天雷打不散，台风刮不倒”。现在广大贫下中农都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保护着集体经济的利益，热爱集体的新人新事，风起云涌，不胜枚举。总之，广大贫下中农群众对集体经济寄予无限的信心和希望。请问吴晗：你到底在为谁“请命”？请什么“命”？我们贫下中农绝对不需要去“请”什么“命”！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退田”！也绝对不允许任何牛鬼蛇神来“退田”！说穿了，你煽动农民“退田”的目

的，无非是要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拆散搞垮，使我们贫下中农回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去，再吃第二遍苦。你这是白日做梦，绝对办不到！

吴晗，你是义乌人，我们知道你的底细。你出生在地主剥削阶级家庭，你是吃劳动人民的肉，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你的知识完全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如今人民不记你的旧账，给了你很高的荣誉和地位，指望你能很好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给人民办一些好事。可是你不但没有将功抵罪，反而恩将仇报，利用人民赋予你的职权，将劳动人民百般丑化，而将那些牛鬼蛇神却捧上了天，甚至居然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了。

吴晗，你是翻案的老手了。你还记得不？那是一九五六年，你的亲戚、反革命分子杨祖霖（当过伪连长，有血债），隐瞒了政治历史和罪恶，混入人民教师队伍，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被我人民政府查明以后，清洗出了教师队伍。他回家以后写信向你鸣冤叫屈，妄图“翻案”。那时，你就同反革命分子杨祖霖站在一个立场上，复信给他，称兄道弟，公然支持他的翻案活动，并亲自写信给浙江省人委负责同志，要求重新查处。后来由于杨祖霖的反革命罪状确实，翻案未能得逞。你今天又来鼓动右倾机会主义者“勇敢”地起来“翻案”，这不是存心拆社会主义的墙脚，搞资本主义复辟是什么？老老实实地警告你：在觉悟了的劳动人民面前，这根本办不到！如果你死不悔改，顽抗到底，那么，只有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把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沈阳市和平副食品商店
副政治指导员 李素文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曲折的，有时候是很激烈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教导是真理。

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就要占领那里的阵地，向人民放毒。吴晗就是这些年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一个最猖狂的家伙。

吴晗利用他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反党、反人民，是一贯的。

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高高地举起了抗日的革命旗帜，坚决进行了抗日救国的斗争，而吴晗却适应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需要，不仅自己钻在故纸堆里，埋头“治学”，还大力鼓吹青年读死书，不问国事。当革命青年起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时，吴晗就承受胡适的衣钵，对革命青年冷嘲热骂，污蔑救亡运动是“装门面”、“显时髦”，故作“爱国表现”。当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这个极端反动、极度腐败的政权的时候，吴晗又出来捍卫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说贪官污吏的根源是由于“家族为本位”的结果。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发展壮大的时候，吴晗担心蒋介石的失败，竭力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要蒋介石吸取“历史教训”，全力以赴消灭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吴晗就出来替美蒋反动派开脱罪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妄想消灭共产党，吴晗却歌颂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

解放以后，吴晗仍然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假借古人之名，行其反党、反人民之实。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吴晗就给擂鼓助威，加油打气，用以古讽今的手法，竭力赞扬他们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党和人民击败并被“罢官”以后，吴晗就鼓励他们要“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失败了再干”，妄想东山再起。

吴晗利用史学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他歪曲历史，硬说旧社会里有“清官”，能为人民谋利益。吴晗美化海瑞，说海瑞敢骂皇帝。

我们要擦亮眼睛，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吴晗是在同党争夺我们年青这一代。有些老工人、老农民亲自受过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用大量的事实，揭穿了吴晗的鬼话，吴晗等人说得天花乱坠他们也不相信。



有些青年人不知道过去的官怎样，只是在戏剧上看到有黑脸的、白脸的、红脸的、花脸的。吴晗就是利用青年这个弱点，来迷惑他们，使他们认不清方向，好跟着他走。

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觉悟，时时记住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分析方法。

在旧社会里，根本没有什么“清官”。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吏所追求的就是衣锦还乡，良田万亩，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欺压群众，作威作福。他们想方设法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让劳动人民永远给他们当牛作马。什么“清官”、贪官，就是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使用很明显的压迫手段，很粗暴，有的使用另一种办法，但是两种办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这样，一伙又一伙，这个上去，那个下来，换汤不换药，他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清官”！

其实，劳动人民早已把他们的底细看透了。不论地主阶级的官也好，资产阶级的官也好，大官也好，小官也好，没有不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他们的道德信条。“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这句话是农民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一个真理，这都是农民从自己长期的悲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在封建社会，像吴晗吹捧的海瑞那样的“清官”是没有的。是狼就是狼，不会摇身一变立地成佛。海瑞要是那样受群众拥护，来反对他的皇帝，他还会当县官、巡抚吗？能升官吗？那是不可能的。

“清官”这个概念，是剥削阶级的虚构，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迷惑人民，便于统治

压迫老百姓，延长他们的统治寿命的。

吴晗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还“破门而出”，企图占领文艺阵地。他写了《海瑞罢官》这个坏剧本，硬说海瑞命令地主退田给农民，是人民的“大救星”。这简直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但吴晗却说，四百年前地主阶级的官僚海瑞就能处处为群众着想，跟农民站在一边。这就是抹杀了阶级斗争，要农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清官”大老爷身上。这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地主用残酷的政治、经济手段来压迫农民，压迫得他们出不了气呵！农民只有起义，用暴力来反抗地主阶级，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吴晗歪曲了我们几千年来文明史，不要劳动人民起来革命。

吴晗为什么这样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竭力美化“清官”，把“清官”说成“人民的救星”呢？说穿了，他美化吹捧的不是什么“清官”，而是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他企图模糊我们的阶级界限，淡薄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疏远我们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让我们留恋旧社会，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这是白日做梦，是绝对办不到的。想搞资本主义复辟，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不答应的。我们一定牢记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吴晗不仅“破门而出”，妄图去占领文艺阵地，他还妄图通过谈论道德问题，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



财经工作总方针，是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商业的根本原则。而吴晗却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把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的道德，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不明明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道德，无非是压迫剥削人民的道德，损人利己的道德。这和无产阶级的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本质上是不同的。

资本主义商业讲“精打细算、多方赚钱”，是为了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小利小干、大利大干、无利不干、唯利是图，是为了投机取巧，千方百计地把劳动人民的钱给“卡下来”，达到他们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损人肥己的目的。

我们社会主义商业的根本目的是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为生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决定的。我们商店的每个营业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要为我们的阶级弟兄服务。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方便群众，为群众服务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提倡精打细算，但是我们不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是在做好为人民服务工作的前提下，提倡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事业，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我们所得的一切利润，归根到底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我们也讲利，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大利，人民的大利。因此，有时即使是无利可得，甚至还要赔钱的买卖，我们也要做，并一定要做好。

资本主义商人对待顾客表面上是非常殷勤的。顾客一进门，就殷勤招待，目的是想让顾客多买他的东西，多赚点钱。我们也讲服务态度热情，但和资本主义商人根本不一样，我们是为阶级弟兄服务的。我们为阶级弟兄服务好了，把他们的干劲调动起来，用到生产和工作上去，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这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高尚的道德，带着资产阶级脑瓜的人，学也学不去。无产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想学我们这些，必须抱着强烈的改造思想的决心，把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手。

很显然，吴晗要我们继承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多方赚钱”的原则，是要把无产阶级的企业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搞资本主义复辟。

吴晗原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地站在亲蒋、崇美、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人，他的历史就是一贯反对人民、反对革命的历史。毛主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永远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时时、处处、事事突出政治，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把我们商店办成一个受人民爱戴的人民商店，坚决回击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把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突出政治，大写英雄

——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

仲正文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塑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新英雄人物的优秀长篇，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好作品，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长篇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形势下，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一个最新的成果。它以其重大的主题、新颖的题材和崇高的形象，为社会主义文学在创作上树立了一个样板，为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创作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这部小说有着十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认为是一部切合时宜的书，是一部突出政治的书，是一部促进我们思想革命化的好教材。

我们认为，《欧阳海之歌》取得的成就、提供的经验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最根本、最中心的一条，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处处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毛主席的书作为创作实践的最高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整个作品的灵魂。《欧阳海之歌》既在作品中做到了突出政治，又在创作过程中做到了突出政治，它既是突出政治的具体表

现，又是突出政治的产物。

作为一本突出政治的好书，《欧阳海之歌》最主要的成就，是大写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完全新型的英雄人物。

在我国，一切社会主义的文学，都必须是突出政治的文学，都必须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学。而要突出政治，要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在艺术创造上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塑造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英雄人物。《欧阳海之歌》所创造的欧阳海的形象，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心胸坦荡、思想透明，毫无私心杂念的，和一切旧思想彻底决裂了的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新人。他真正是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描述过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是当代许多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的优秀思想、优秀品质的高度概括。他来源于真人真事，但不拘泥于真人真事，他比实际生活中的人物“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样思想高尚，形象



丰满，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在以往的长篇创作中还很少看到过。因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十分可贵的创作成就。

《欧阳海之歌》在英雄人物的创造上是怎样突出政治的？

首先，它写出了毛泽东思想在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当代，所谓英雄人物，就是具有毛泽东思想的人物；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英雄人物。从小说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欧阳海的成长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他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欧阳海出身贫苦，在最初，他只有一种朴素的阶级觉悟。带着深厚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走进了新社会，入了伍。开初，他想的也只是像董存瑞那样，当一名战斗英雄，为自己受压迫的一家人报仇，杀敌立功，把喜报寄回家去。思想还远远不是共产主义的。他愿意到福建前线去打反动派，愿意到西藏去打反动的农奴主，却不安心按照党的分配在后方搞施工、训练。这时连队的干部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的思想，教育了他。在他懂得了施工也是干革命的道理，在工作取得了成绩、受到了表扬之后，欧阳海对待荣誉的正确态度还是没有解决的，他脑子里想的仍是大红花、挂着冲锋枪的照片，和个人的出头露面。这时，指导员曾武军根据毛泽东思想，用重锤敲打他这面响鼓，使他懂得了我们干革命为的是人民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经过党的教育，共产主

义思想因素在他脑子里逐渐增长了，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更饱满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更提高了，他决心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终于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

欧阳海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他对毛主席著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从指导员曾武军那里，懂得了毛主席著作是为穷苦人写的，是为闹革命的人写的，是我们为人民服务、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干世界革命的法宝。他从指导员曾武军身上，也从自己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得到了曾武军送他的三卷《毛泽东选集》之后，他如饥如渴地学着，不分白天、黑夜，工作忙闲，有空就读，有机会就记。他文化水平低，就买一本字典，边查字边学习；自己不会，就去问人。为了买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他夜里兴奋得睡不着觉，天不亮就赶到书店去。……

第二，他能够活学活用，不仅注意“学”字，而且特别注意“用”字。他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为了教育别人，而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例如，他原先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战士高翼中有些恨铁不成钢，工作方式上有些急躁，经过“两忆三查”学习，诉了阶级苦，认识到和高翼中是一条蔓上的苦瓜；又反复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感到自己对高翼中还关心不够、帮助不够、爱护不够。于是，就主动向高翼中作



了检讨，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高翼中多方关心、爱护和帮助。以后，在为公社拣茶籽的过程中，高翼中怕艰苦，他起初又有些发急。可是，读了《愚公移山》，读了《矛盾论》，他的思想又豁然开朗了，觉得帮助高翼中不耐烦，主要是自己缺乏愚公移山的精神，没有看到高翼中思想进步的主流。他深有所感地说：“这关键的关键在我自己身上呵！”

第三，他做到了学用结合，学一点用一点，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学习的主要方法，是带着问题学，有了问题到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例如，在由副排长调任营部通信班长的时候，他带着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愉快地接受了新任务，工作做得很出色。以后，在和代理副指导员薛新文的关系中，他遇着问题就去找毛主席著作，充分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正确解决了和薛新文的关系问题。

总之，欧阳海真正做到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毛泽东思想，使他由一个贫农的儿子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

欧阳海的成长过程，对于我们是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教育意义的。欧阳海成长的道路，就是我们青年一代革命化的道路。

欧阳海是个好战士，但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好战士，而是一个集中了无产阶级各种优秀思想品质的出类拔萃的伟大共产主义战

士。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当代工农兵各种英雄人物共有的各种好思想、好作风、好品格。当代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欧阳海就是概括了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一个性格完美的典型。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明确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他有充沛的革命干劲，忘我的劳动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战胜一切困难的毅力；他有敢于挑重担、坚持高标准的工作态度；他对待同志亲如兄弟、暖若春天，对待群众，爱如父母，关怀备至；他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资产阶级思想嫉恶如仇；他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对待别人的缺点、错误，能进行原则斗争，对待自己的缺点也一丝不苟；他处处舍己为人，表现了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他心胸开阔，高瞻远瞩，时时不忘支援世界革命的重任。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不图名，不为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在他身上都有明显而突出的表现。如果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来衡量他，他是当之无愧的。

欧阳海又是一个平凡的、平易近人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他的行为，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只要积极努力，认真去做，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平凡，不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提倡的那种卑微的身边琐事，阴暗的苟且心理；我们指的是一切有益于人民的革命工作，和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事业所不可缺少的一切革命行动。一切平凡的革命工作



中都包含着伟大的革命意义。怀抱着远大的理想，去从事一切革命工作，都可能从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的成绩。欧阳海的思想发展过程正是这样：当他抱着当英雄、争荣誉的想法去做工作的时候，工作得并不出色，并没有受到周围群众的赞扬；当他懂得了自己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伟大意义，安于平凡的工作岗位，积极完成上级分配给自己的一切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做出了极为出色的成绩。不安于平凡的革命工作，想当英雄，终不能成为英雄；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创造性地做好一切平凡的工作，甚至成了英雄，反不自觉其为英雄。这就是我们革命者的生活逻辑。欧阳海就是这样从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而成为英雄的。看，他在部队生活的短短数年，做的工作多么平凡哪！砍树木，扛木柴，打炮眼，抡大锤，担土，挖泥，修桥，筑路，训练，学习，拣茶籽，砍毛竹，救人，救火，帮助公社劳动，和战友、和自己的亲人进行思想互助，等等。但是，面对这些平凡的工作，可以做得平凡，也可以做得不平凡。欧阳海因为彻底解决了世界观问题，所以他做到了后者。

欧阳海具有雷锋、王杰、董存瑞、黄继光、麦贤得等英雄人物共同的特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也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最崇高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英雄行为，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革命化的结果，来源于平时党对

他的培养和锻炼。欧阳海在短暂的时刻里，向着飞奔而来的火车冲去，脸不变色，心不跳，这是毛泽东思想在他身上发出了闪光，靠的是平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头脑。只有在平时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才能表现出最大的勇敢，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聪明的人，最勇敢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在欧阳海身上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产生英雄人物的革命品质、革命情操的最大动力，是勇敢、无畏的唯一源泉。

围绕着欧阳海英雄形象的创造，小说写出了产生这个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通过欧阳海的成长道路，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军和我国人民灿烂的现实生活，歌颂了我们伟大的现实，赞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赞扬了在一切实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伟大胜利。它描写了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描写了我军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工作。几年来我国人民经历的三大革命运动和重大的斗争，诸如战胜灾荒，西藏平叛，加强战备，反帝反修……；我军在大学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中出现的新面貌，都得到了较好的恰当的反映。我们读着作品，处处觉得那样亲切、生动、丰满、鲜明，原因就是作品把我们伟大的社会现实，把毛泽东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开花结果的生动图景，都和盘托出了。正由于作者把英雄形象的创造放在如此



广阔的现实背景上，所以，它既充分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也大大地丰富了人物性格。

《欧阳海之歌》在英雄人物创造上得到的成功，和它在读者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再一次雄辩地说明了：努力塑造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有着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世界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所谓“英雄人物”。流氓，阿飞，盗匪，杀人犯……那是资产阶级最反动、最腐朽、最没落的文学中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毒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杀人不见血的暗箭和毒药。叛徒，怕死鬼，流浪汉，阿飞式的青年男女，利欲熏心的个人主义者，……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学中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是腐蚀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麻醉剂和进行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工具。我国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或者热衷于写什么有“缺点”的英雄，或者提倡写什么“中间人物”，写所谓“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目的，是丑化劳动人民，歌颂资产阶级，诋毁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可见，在要不要写英雄人物，写什么样的英雄人物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文艺家只会去歌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去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去创造无产阶

级的英雄人物。至于我们，则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一定要大力地、全心全意地歌颂无产阶级，歌颂劳动人民，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歌颂伟大的党，歌颂伟大的领袖，歌颂我们无产阶级的新英雄人物。社会主义文学是兴无灭资的文学。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也应该是兴无灭资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等，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我们的笔应该着力去描写他们。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力创造的，应该是为毛泽东思想所教育、所武装的共产主义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对人们的鼓舞力量是最大的，教育作用也是最直接的。

为了创造我们时代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欧阳海之歌》在艺术形式上也冲破了过去的框框，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这本小说，没有一个贯串到底的中心事件，没有尖锐激烈的贯串全篇的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连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也只有欧阳海一个，但是，它却那样吸引人，那样感人，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首先是因为作品的思想性强，毛泽东思想表现得深、透、鲜明、生动，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震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弦，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共鸣。其次在于写出了千万人心目中向往的、仰慕的、急于要学习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在欧阳海身上，既体现了千百万人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的社会现实，又体现了人们为之朝夕奋斗、孜孜追求的远大理想。此外，还由于作者依据内容的需要，创



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这种形式和风格的特点，就是充满革命激情，非常政治化，调子很高昂。我们读着小说，总觉得书中的政治空气是那样浓郁，思想境界是那样高，格调是那样铿锵有力，革命的热情是那样澎湃激越，语言是那样简洁明快。我们认为这是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一个可喜的成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新的文风。

所谓“非政治”的倾向，以及颓废的、悲观沮丧的感情，软绵绵的、低沉的调子，艰涩晦暗的语言，是资产阶级文学的文风。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是全心全意，千方百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因而它应该是阶级立场明确，是非爱憎分明，渗透毛泽东思想，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政治化的文学；应该是立脚点站得高，胸怀开阔，有革命气魄，充满革命激情的文学；应该是调子高昂，语言准确、生动、明快、简洁，体现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审美观点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要描写新的阶级，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就必须采取新的艺术方法，逐步形成新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对于古代的、外国的艺术形式，我们要研究，要继承，要学习，要借鉴，但我们更必须从生活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和喜爱出发，从内容出发，大胆地创新。研究、借鉴，是为了古为今用，外为中用，而且要有利于创新。我们要敢于树雄心，立壮志，敢于在文学事业上，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

产阶级之异，走出自己的道路来。

《欧阳海之歌》突出政治的另一个表现，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了自己整个的创作活动。

一九六四年，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在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向部队文艺创作人员，提出了“三结合”“三过硬”的要求，《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就是依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林彪同志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去做的，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欧阳海之歌》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地活学活用了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作者和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作者和战士在一起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又不断地带着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能把自己摆进去，首先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向自己的思想开战。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才比较正确地认识了部队生活，懂得了战士的思想感情；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才逐渐缩小了和战士的思想差距，理解了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才摸索到了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英雄人物和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特征的艺术技巧。毛主席著作，真正成了作者的创作指针，成了打开一切困难问题的钥匙，给了作者以智慧、力量和方法。



创作的过程中，作者长期地、不断地深入了部队生活，不断地在火热的斗争中逐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作者没能在欧阳海生前见到欧阳海，却写出了欧阳海；通过写欧阳海，又把整个部队这几年的现实生活，乃至我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写得那样生动、形象、丰富、多采。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作者不是为了要写欧阳海才去生活的；而是因为在长期的部队生活中首先熟悉了许许多多欧阳海式的英雄人物，才去写欧阳海的。几年来，作者不断地深入连队当兵、蹲点，参加了部队的各种实际斗争，结识了许多战友，把部队生活摸熟了，把战士的心摸透了。特别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经常注意向战士学习，向先进人物学习，使作者的思想与英雄人物逐渐接近了。这些直接的生活感受和从欧阳海的战友那里取得的关于欧阳海生平事迹的素材，就构成了作者进行创作的丰富源泉，而直接的生活感受又是进行艺术创造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几年以来作者自己的思想变化、生活积累和“库存”，想取得今天的创作成果是不可能的。

当然，《欧阳海之歌》的成功，只是作者在创作上的一个实践，一次飞跃。今后还要不断地学习提高，改造思想，加强实践，才有可能产生新的飞跃，取得新的进展。

《欧阳海之歌》创作的过程，也是在文艺创作中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小说构思之初，作者所在部队的领导曾给作者以极其重要的指示：“写英雄，是为了写我们伟大的

党，写我们的时代。要通过欧阳海的成长写出部队几年来的变化。”这个指示对于小说主题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上又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作品的修改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帮助。特别在作品核实、修改的过程中，地方和部队的有关领导部门，欧阳海的战友，欧阳海家乡的群众和亲人，都积极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积极参加了创作活动。所以，《欧阳海之歌》的成功，又可以说是个群众性的集体创造。没有领导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想取得今天的创作成果，也是不可能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三结合”是符合社会主义创作规律的、发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好办法。

《欧阳海之歌》的出现，是突出政治的一次新胜利，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一次新胜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新胜利；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已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颗威力巨大的精神原子弹，将在我国的思想战线上和文艺战线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将对促进千百万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起重大作用。

中国人民需要这样的作品，全世界被压迫的、革命的人民需要这样的作品。让我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鲜明旗帜，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歌颂伟大的人民革命、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的作品吧！

